



北朝敦煌写本《大般涅槃经》——丝路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吴京攀

“文献之邦——江南版本文化概览”是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以下简称“杭州馆”)的常设展览,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华版本故事的窗口。在该展览的“写本时代”单元,展出了一件北朝敦煌写本《大般涅槃经》。古朴的经卷、遒劲的书法,吸引众多观众驻足欣赏。

《大般涅槃经》是佛教重要文献,曾在丝绸之路广泛传播,是丝路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它被译成汉文和藏文等文字,对中国佛教产生重要影响,传世版本主要包括法显版、昙无讖版、慧严版和德胜版等。

《大般涅槃经》的重要性在敦煌文献中得到充分体现:敦煌文献中共有《大般涅槃经》3064号,数量仅次于《法华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抄写时代从公元5世纪一直持续到10世纪。杭州馆藏《大般涅槃经》为残卷,后人为它装裱了卷轴。每行17字(个别为16字或18字),共计1447字。所抄内容为北凉昙无讖译《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一的部分文字。昙无讖是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译经师,出生于公元4世纪末的中天竺(今印度)。他自幼聪慧、悟性极高,“至年二十,颂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后辗转西域多地钻研佛学。他翻译的众多佛教文献传播甚广,直接推动了北凉佛教的发展,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在昙无讖所有译经中,历时8年、完成于北凉玄始十年(公元421年)的《大般涅槃经》最具影响力。此经译成后迅速南传,南朝宋文帝元嘉中期(约公元430年)已传至建康(今南京)。其后流传范围不断扩大,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以来,陆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这一背景下,敦煌逐渐发展为沟通中原和西域的交通枢纽、丝绸之路沿线的商业中心、各民族与文化交汇的场域。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社会相对稳定,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昙无讖等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原,翻译佛经、传播佛教文化,莫高窟也因此兴起。

莫高窟坐落于河西走廊西尽头,位于敦煌东南25千米处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20世纪初,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世界。1900年,莫高窟17号洞窟内发现各类文献数万件。后来,人们将这批文献称为“敦煌文献”,又称作“敦煌写本”“敦煌文书”“敦煌卷子”等;将保存这批敦煌文献的洞窟称为“藏经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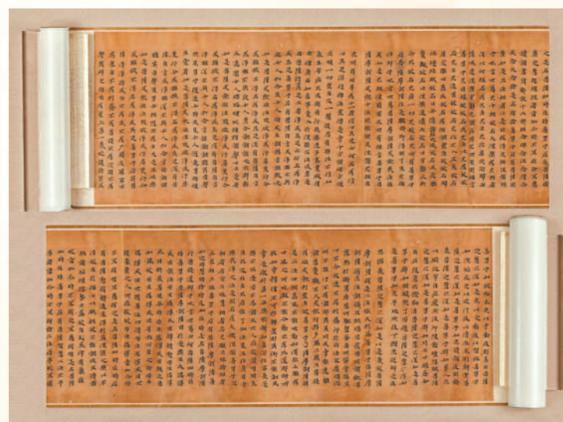
敦煌文献上起魏晋六朝,下至宋初,前后跨越600多年。敦煌文献中,以唐、五代时期的文献为主体,前承吐鲁番文书,后接宋、元刻本及写本文献,是唐、五代纸本文献的主要实物遗存,有“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之誉。学者将其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明清档案并称为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

敦煌文献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敦煌文献形式多样。一是语言丰富多样,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粟特文等多种民族语言文献。二是文本形态多样,除写本外,还有少量刻本和拓

本。其中的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金刚经》,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标有明确年代的雕版印刷品。三是装帧形态多样,包括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等各种装帧形态。另一方面,敦煌文献内容丰富。敦煌文献中有历史地理文献、宗教文献、汉文古籍、官私文书、文学作品等,为我们研究中古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风俗、民众信仰、不同阶层文化情况等提供了丰富资料。在敦煌文献中还有大量反映丝绸之路的文献,如宗教东传的记录和中原文化西传的记载,还有市场物价表、旅行者的书信、买卖契约等直接印证丝绸之路的文书,真切反映出古时丝绸之路的整体面貌与经贸往来细节。

藏经洞被发现时正值清末,大量敦煌文献被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等人攫取,其中就包括《大般涅槃经》。据统计,敦煌文献目前总数约70000号,国内主要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总数16579号)等机构,其余散布于英国国家图书馆(总数17000余号)、法国国家图书馆(总数7000余号)、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总数19870号)及日本、印度、德国、美国等国家。敦煌文献大半流散海外,一度出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情况。为改变这一局面,中国学者做出了不懈努力。罗振玉是敦煌文献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在他的敦促下,伯希和陆续寄回收藏敦煌文献的照片供中国学者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敦煌文化的保护、整理、研究及传播逐渐上升到国家层面,成为重大文化事业。在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下,中国重新成为敦煌学研究中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促进敦煌文献的回归。如今,敦煌遗书数据库已正式上线,全彩印《敦煌文献全集》出版工作也已启动。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



图为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展出的《大般涅槃经》。

吴京攀供图

与西安空港新城图书馆签署《互建丝路图书馆协议》,以学术研讨、图书推荐、文物展示等方式促进两国民间文化交流。

除汉学研究,傅马利对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希伯来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均有研究,对跨文化交流有着深入思考。在他看来,不同文明之间存在诸多共通之处,这是国与国、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共同进步的重要前提。他说,当我细细品味张择端的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时,会不自觉地代入现代米兰繁华街头的场景,相隔千年、相距万里,画面展现的人类社会风貌高度相似。再比如,当我在中国参加自己的新书发布会时,会想到拉斐尔的壁画《雅典学院》:热爱阅读的中国读者提出许多高水平问题,蕴含诸多思考,这与画中希腊哲学家们探求真理的精神别无二致。人类文明的精华能够跨越时空,以我们都能理解的方式流传至今。



③

傅马利高度赞同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在他看来,欧洲文艺复兴肇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拜占庭和阿拉伯国家保存的古希腊罗马典籍回传到欧洲,促进了思想繁荣,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全球文明倡议有利于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促进相互理解,进而保证和平与发展。”他说。

当前,中意文化交流不断丰富,包括昂布罗修图书馆在内的许多意大利博物馆藏品都曾在中国展出,意大利民众对书法、茶艺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傅马利的外孙曾在中国学习,这让他与中国的缘分又多了一层。谈及两国友谊的明天,他的期待充满诗意:“我家里挂着一幅书法作品,上书毛泽东主席的词作《卜算子·咏梅》,我想引用其中的一句表达心意——‘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图①:2023年11月,傅马利在陕西西安出席昂布罗修图书馆与西安空港新城图书馆互建丝路图书馆签约仪式并致辞。

图②:傅马利所著《美学、科学与信仰:昂布罗修图书馆跨越400年的探索》。

以上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图③:昂布罗修图书馆外景。

约翰内斯摄(影像中国)

一座图书馆和一位汉学家的故事

谢亚宏

人也有着许多故事。作为资深汉学家,他先后到访中国30余次,有时一年就要去3次。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位汉语流利、学养深厚的汉学家年过四旬才走上汉学研究之路。在米兰圣心天主教堂攻读期间,他先后学习了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等语言,虽一心想学习中文,却由于当时师资缺乏而难以实现。“我在昂布罗修图书馆攻读博士学位时,当时的馆长十分希望我从事汉学研究,不仅向我介绍图书馆馆藏的中国古籍,还将他的一本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词典赠送给我。”至今想来,傅马利仍充满感慨。

1994年,傅马利终于在米兰意中协会的帮助下开始学习中文,并于1995年首次来到西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现国际教育学院)进修。对他而言,这是一次难忘而美好的经历:“西北大学专门派车接我到校园,老师和同学都非常热情,学习氛围轻松愉快,我结交了很多朋友。”至今,傅马利仍与许多老师同学保持着联系,每次去西安都会拜访,他们来意大利也会被傅马利邀请到家里做客。

学成归国后,傅马利先后任昂布罗修图书馆东方研究部主任、副馆长和意中协会资深理事等职。他力促昂布罗修图书馆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大学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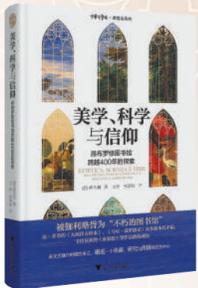
等中国高校建立合作关系,邀请中国专家到图书馆访学交流,并于2008年发起成立“中华文化研究所”。“目前,研究所每年都在《昂布罗修亚洲年刊》上介绍我们在意中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成果,这份努力将持续下去。”他说。

前不久,傅马利卸任所有行政职务,但依然在西北大学等中国高校担任客座教授,活跃在意中文化交流第一线。去年10月,他关于昂布罗修图书馆藏品研究的最新专著《美学、科学与信仰:昂布罗修图书馆跨越400年的探索》在中国翻译出版。提及这本书,傅马利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我知道中国朋友经常用‘为人民服务’表达投身公益事业的热情,这也是昂布罗修图书馆数百年来坚持的宗旨。我希望将更多意大利的历史文化、意中交流的故事分享给中国朋友,为人民服务、为两国友谊服务。”

前不久,傅马利卸任所有行政职务,但依然在西北大学等中国高校担任客座教授,活跃在意中文化交流第一线。去年10月,他关于昂布罗修图书馆藏品研究的最新专著《美学、科学与信仰:昂布罗修图书馆跨越400年的探索》在中国翻译出版。提及这本书,傅马利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我知道中国朋友经常用‘为人民服务’表达投身公益事业的热情,这也是昂布罗修图书馆数百年来坚持的宗旨。我希望将更多意大利的历史文化、意中交流的故事分享给中国朋友,为人民服务、为两国友谊服务。”

一份充满诗意的期许

作为文明古国,中意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交往。傅马利认为,昂布罗修图书馆自创立伊始便见证了意中之间文化交流的悠悠历史:在《万国全图》之外,图书馆还有许多与中国相关的典籍、文物,比如馆藏的《马可·波罗游记》手抄本等



②

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以“时尚之都”闻名于世,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历史底蕴亦保留于城中诸多古老建筑中。老城中心一隅,诞生于17世纪的昂布罗修图书馆静仁于此,颇有些“大隐隐于市”的意味。图书馆门前,昂布罗修图书馆前馆长、汉学家皮埃尔·弗朗切斯科·弗玛加利(中文名傅马利)正微笑着迎接我们的到来。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言谈间对中国典故信手拈来,对于推动意中文明交流互鉴,有着独到见解。

一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图书馆

昂布罗修图书馆创立于1607年,被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誉为“英雄且不朽的图书馆”。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自创建伊始,昂布罗修图书馆便坚持对公众开放,以“为所有具有艺术或思考才能的人提供免费的文化教育”为宗旨。经过数百年发展,图书馆已收藏有上百万册书籍和4万多份手稿,其中许多都是孤品。

图书馆创始人费德里科·博罗梅奥曾写道,来自不同文明的书籍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好处,让我们了解许多既美丽又有益的事情”。因此,最初的馆藏不少购自世界各地的傅马利自豪地说:“我们收藏有古印度和阿拉伯的宗教典籍、古罗马时代的碑铭和古埃及莎草纸文献……对于所有这些文献资料,我们一直坚持向世界各地的读者免费开放借阅,希望大家能共同探寻不同文明的足迹。”

昂布罗修图书馆是艺术的殿堂,达·芬奇超过1000页的手稿《大西洋抄本》和拉斐尔的《雅典学院》素描草图是馆中最著名的艺术珍品。由于馆藏艺术陈列丰富,图书馆在成立后不久就设立了美术馆和绘画学院,供艺术爱好者临摹学习。目前,对公众展出的《大西洋抄本》仅有寥寥数页,上面绘制的草图和笔记仍旧清晰表达着达·芬奇对人体结构和机械制造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让人不禁对这位艺术家超越时代的想象力击节赞叹。在讲解抄本笔记内容时,傅马利说出自己的心愿——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集合意中专家,完成在中国翻译出版《大西洋抄本》的浩大工程。

昂布罗修图书馆的不少藏品都与中国相关。在珍本阅览室,傅马利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幅卷轴,一张中文世界地图展现在眼前,卷轴四角的“万国全图”字样清晰可见。这幅《万国全图》最早出现在意大利人艾儒略与中国明代官员杨廷筠于1623年合作出版的《职方外纪》中,是现存最早的中文世界地图之一,向当时的中国社会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最新发现。“这是中国与意大利、与西方文明交流的早期成果之一,也是我研究的重点课题。”傅马利介绍道。

在阅览室中,笔者见到,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人正埋头苦读。傅马利说,为更好利用馆藏文献,昂布罗修图书馆于2008年成立研究院,并与全球数百名不同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向世界敞开大门,希望全世界人民加深相互理解,促进和平与发展。”他说。

一个为两国友谊服务的心愿

与昂布罗修图书馆一样,傅马利本

旅人心语

印象中,南非的好望角是非洲大陆最南端。不少史料介绍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是1488年“带领船队航行至非洲大陆最南端并发现好望角”,另一位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则是1498年“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开辟了从欧洲绕道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线。甚至一些权威报刊也不乏“南到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好望角”等描述。

然而,到实地探访,不必他人指点,就明白那些说法有误:距好望角不远,波浪翻卷中,矗立着一座上立灯塔、怪石嶙峋的山峰,有一面如刀削般的峭壁伸向大西洋。这就是与好望角纬度在伯仲之间的开普角,感觉就比好望角更南一些。根据山腰一处展览室内地图上的有关经纬度记载,开普角的确比好望角纬度多了一秒,也就是说,比好望角更往南30米左右。

登峰眺望,山下的好望角像一只鳄鱼劈波向西,向东则依稀可见绵亘东去而在遥远处南向的海岸线。那里是纬度更高、方位更南的所谓“危险角”,是当年迪亚士命名的一处海角。这里比好望角纬度多了16分多,更向南近30公里。但这仍不是非洲大陆最南端。真正的最

好望角踏勘

士心

南端,是在危险角东南的“厄加勒斯角”,纵向北距好望角50多公里,那里才是大西洋与印度洋的交界处。厄加勒斯角意为“针角”,指罗盘上的磁针在这里没有一点偏角地指向正北方向,这意味着在这个地域,地磁北极与地理北极的方向正好一致,颇为奇特。

好望角更加奇特,不仅有“非洲大陆最南端”的误解,附近海域也曾让不少人产生认知偏差。开普角与危险角遥遥相对之间的这片海湾,称为“法尔斯特贝”,意思是“虚假湾”。之所以有此怪名,是由于一些航海者,常常误以为这里是位于今开普敦市的“渠湾”——庆幸在历经大西洋上的狂风巨浪之后,终于进入了相对平静的海湾,来到后来成为航行中途补给站、直至发展成为南非第二大城市开普敦。实际上,船只还须驶出这片海湾,或许还要历经大西洋上的狂风暴雨,才能到达好望角以北的今开普敦市区。“虚假湾”之名,既是航海历史的真实反映,又像是将许多人把好望角当成非洲大陆最南端这一误解的预言。

不过,哪怕破除了几百年来的误解,一时倒还未影响到好望角的知名度。除了厄加勒斯角附近地势相对平缓,不像

好望角峻峰兀立、撼人心魄,更多是缘于航海先驱的传奇,让这里的故事先入为主。

当年,迪亚士的船队在这附近遭逢大风暴几至覆没,最终巨浪把船只冲到一个无名岬角上才得以幸存,他遂将其命名为“风暴角”。因为船队向南绕过这一岬角后,附近的海岸线向北向东,让迪亚士误以为已经到达非洲最南端。他认为继续沿海岸线东行,便可抵达印度。但或许惊惧于好望角的“杀人浪”且存粮不多,船员不肯继续前行,迪亚士只好率船队返航。回程经过好望角时,适逢晴美丽日,这个隐藏了不知多少岁月的壮美海角,给劫后余生的船员们留下深刻印象。据说迪亚士返回里斯本时,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认为既已到达非洲最南端,打通前往印度的航路就有了希望,遂有好望角之名。不过也有说法认为,是10年后达·伽马的船队成功到达印度并满载而归,约翰二世才将风暴角改名。

后一说法有明显讹误:这位国王在达·伽马1497年启航寻找印度前的1495年就去世了。只要简单对一下两个时间,就能看出舛讹,正如细看世界地图上的非洲大陆或南非地图,就马上会发现

好望角不是非洲大陆最南端一样。但这一说法却以讹传讹,误导了不少人。

古语说,百闻不如一见。自己到他处实地看一看,才能驱散脑海心洋的认知迷雾,触摸世界的真实;欢迎他人到自己这里看一看,更易破除认知偏见,改变刻板印象。当然,到了好望角,还能看到当年让达尔文感悟物种进化的原生态植物宝库,那间或有佛佛、非洲被角大羚羊等一跃跃过,一望无际的灌木花野,还有惊涛拍岸的好望角山边,已标明“非洲大陆最西南端”的木牌,遐思海洋开拓者的勇气,更领悟有关矫正认知、探求真知的途径与哲理。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雷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蔡华伟